



贵州佛教文化史

GUIZHOU FOJIAO WENHUA SHI

● 吴道军 纳光舜 马虹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佛教文化史

GUIZHOU FOJIAO WENHUASHI

● 吴道军 纳光舜 马虹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佛教文化史 / 吴道军, 纳光舜, 马虹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21-12341-1

I. ①贵… II. ①吴… ②纳… ③马…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文化史—贵州省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4810号

贵州佛教文化史

吴道军 纳光舜 马虹 / 著

出版人 / 苏桦

特约编辑 / 禄佳妮

责任编辑 / 谢丹华 周湖越

装帧设计 / 郑亚梅 禄仲春

出版发行 /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印刷 / 贵阳恒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 / 16

印张 / 16.5

字数 / 360千字

书号 / ISBN 978-7-221-12341-1

定价 / 58.00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佛教文化传入贵州的途径	(4)
第一节 蜀身毒道	(4)
第二节 南夷道	(10)
第三节 荆楚黔道	(14)
第二章 唐宋时期贵州佛教文化	(17)
第一节 唐代以前贵州经济社会状况	(17)
第二节 唐代以前佛教文化对贵州的影响	(18)
第三节 唐代(含五代十国)贵州佛教文化	(21)
第四节 宋代贵州佛教文化	(30)
第五节 佛教文物	(36)
第六节 唐宋时期贵州佛教文化传播的特点	(37)
第三章 元代贵州佛教文化	(39)
第一节 僧人传教活动	(39)
第二节 寺庙创建	(42)
第四章 明代贵州佛教文化	(46)
第一节 贵州建省使佛教传播增益	(46)
第二节 寺庙建设	(51)
第三节 建文帝与贵州佛教文化	(59)
第四节 “三教合一”思潮对贵州佛教文化的影响	(64)
第五节 明代政府对佛教的管理	(69)
第六节 文学艺术	(71)
第七节 明代贵州佛教文化的特点	(87)

第五章 清代贵州佛教文化	(91)
第一节 清初贵州佛教文化迅速传播	(91)
第二节 寺庙建设	(104)
第三节 清中叶后贵州佛教文化的衰落	(111)
第四节 清政府对佛教的管理	(126)
第五节 文学艺术	(131)
第六章 民国时期贵州佛教文化	(161)
第一节 贵州佛教文化的复兴	(161)
第二节 佛教文化传播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	(171)
第三节 宗派	(181)
第四节 佛教组织及活动	(187)
第五节 佛教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196)
第六节 佛教事务管理	(203)
第七节 文学艺术	(206)
第七章 当代贵州佛教文化	(213)
第一节 佛教的新变化	(213)
第二节 反封建迷信和取缔会道门对佛教的影响	(218)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贵州佛教	(222)
第四节 新时期的贵州佛教	(227)
第五节 当代贵州佛教文化传播的特点和问题	(247)
第六节 全面贯彻宗教政策法规 大力推进佛教事务管理	(254)
后 记	(259)

导 言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即释迦牟尼）创立。公元前3世纪起，佛教开始向外传播，通过与东西方不同文化和宗教交融，最终发展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汉末至三国时期，到中土传播佛教的安世高、支娄迦谶开始翻译佛经。魏晋时，佛教般若学与玄学贵无派结合，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南朝宋文帝、梁武帝等，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支持创建寺院，修建斋会等。北朝发生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事件，使佛教传播受到阻碍，但并未改变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总趋势。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鼎盛阶段，佛教宗派随之出现。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又名法华宗）、三论宗、贤首宗（又名华严宗）、唯识宗（又名法相宗、慈恩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两宋时，禅宗独盛。佛教的基本理论为儒家吸取，成为道学思想的重要渊源。佛教各宗派间差别逐步缩小，并日益与儒家和道教相调和。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也保护汉地佛教。明末，株宏、真可、德清、智旭等，内融禅、教，外通儒、道，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有一定限制。到康熙朝禁令稍弛。雍正主张儒释道异用而同体，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璧大藏全咒》，推动了佛教的发展。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竟无等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中国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接受并宣传佛学思想。民国时期，在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和弘一等佛教界人士推动下，佛教发展出现了新的面貌。

7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西藏，由此形成藏传佛教（也称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等。此外还有过一些小派，如希解派、觉域派、郭扎派、觉囊派、夏鲁派等。藏传佛教主要传播于中国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地区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俄罗斯布里亚特等国家和地区。

7世纪佛教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由此形成南传佛教（亦称南传上座部佛教）。11世纪前后，因战祸而受重创。后由泰国经缅甸再度传入西双版纳。云南地区南传佛教分为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和左抵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佛教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佛教受到冲击，寺庙、佛像被毁，僧尼被批斗、遣散。1980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后，中国佛教有了新发展。佛教组织进一步建立健全，佛教僧才培养加强，佛教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中国与各国佛

教界的交往不断增进。

佛教于东汉末期开始影响贵州。唐代有僧人活动并建寺庙。宋元时期逐步发展。明代至清中叶达到鼎盛阶段。主要有禅宗（临济宗和曹洞宗）、净土宗、密宗、法相宗、天台宗及华严宗等派别。2013年，全省信教人数约30万人，僧、尼490余人，经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的寺庙416座。教徒遍布全省，以遵义、贵阳、安顺为最多。佛教传入贵州，对地方传统文化和民俗产生了一定影响。

贵州佛教研究开始于民国初期，新中国成立后缓慢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各方面研究增多；有著作8部，研究文章140余篇。这些著作和文章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贵州佛教历史与现状，为深入研究贵州佛教提供了借鉴。但总体看，研究佛教的著作中，涉及现代的研究成果很少。如王路平《贵州佛教史》，在贵州佛教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资料丰富，论证严谨，对贵州佛教历史事件、寺院、人物均有较全面的介绍。林建曾等著《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以中国西南三省（含重庆市）宗教为研究对象，其中的贵州部分对贵州佛教的初传、普传、流变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限于篇幅，贵州佛教部分仅为8万字，许多研究范畴都未能展开。以上两书的时间下限均为1949年。许桂灵、司徒尚纪在《暮鼓晨钟：佛教寺院文化人类学考察》中，以贵州贵阳弘福寺为研究对象，除历史的介绍外，集中研究了寺院结构和功能，僧、尼生活，佛教与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研究方式及理论上均有创新。但弘福寺仅为城市寺庙的典型，而贵州寺庙主要在乡间，乡村寺庙历史与现状研究仍十分稀缺。文志高《梵天佛地》，吴恩泽《名岳之宗梵净山》，为介绍性著作，两书各有侧重，部分资料有较高参考价值。但理论上的研究不是两书的范畴。政协铜仁地区工作委员会编著《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文物研究》，具有志书的特征，对梵净山寺院、佛像艺术、经书法器、碑碣摩崖、僧墓佛塔、弥勒文化、禅宗法脉、诗词文献分类做了详细考订和记述，收集资料范围广，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龙海碧主编《梵天佛地——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王路平主编《贵州佛教文化的典型图像——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黄尚文《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3本专著，全面论述了梵净山佛教缘起、发展、鼎盛、流变的历史面貌，梳理了梵净山禅宗的传灯系统和禅学特点，分析了梵净山佛道儒巫混杂的现象、特征和原因，研究了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三本梵净山佛教专著，将这一领域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得益于铜仁市政府的重视和广大社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也得益于梵净山地区丰富的佛教历史文化遗存。相比之下，同样是贵州佛教名山的遵义金鼎山、长顺白云山、盘县丹霞山的研究就十分薄弱。如果各地佛教名山、名寺都能出一些研究成果，则贵州佛教研究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这也是贵州广大宗教研究者所共同期望的。这一方面说明贵州佛教文化研究空间还很大，领域也比较宽；另一方面也表明贵州佛教文化研究还有不足。

贵州佛教研究文章共有140余篇，其中80%集中在历史研究部分；18%为佛教与旅游研究；仅有2%为佛教与社会研究。很显然，对佛教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作用研究太少，至今还没有一本全面系统研究贵州佛教历史与现状的专著；佛教历史悠久，与民众生活联系密切，应当运用多学科（如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

俗学等)理论进行研究,这在现有成果中,较为欠缺;贵州佛教文化与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信仰关系密切,但过去对这两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贵州信仰佛教人数为30万人,参加佛教节日活动的群众有400多万人,信教群众遍及全省。近年来佛教人数增加较快(每年约增加0.5万人)。佛教在贵州社会发展中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今天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佛教文化在贵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摒弃认为佛教是“封建迷信”等错误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通过研究佛教的历史和现状,以科学、翔实、严谨的研究成果,为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佛教提供理论支持,推动佛教界面向社会,正教风,树形象,服务社会;为党委、政府制定宗教政策、法规提供参考。

佛教既是一种信仰体系,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佛教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逐渐形成以信仰为核心的佛教文化传统。佛教文化在自身发展中与其他文化形态相交融,产生了佛教哲学、佛教伦理学、佛教文学、佛教艺术等,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蕴含于佛教的有形形态和无形形态中。前者包括佛教场所的建筑、雕塑、碑刻、经卷、绘画及佛教仪式中用到的各种器物等;后者指佛教观念和思想、情感和体验、行为或活动、组织和制度四个基本要素。佛教文化主要通过宗教活动、家庭教育、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如人口迁徙、商贸活动、印发书刊和报纸,以及当代的影视广播、手机、互联网)等方式传承。在当代,佛教文化影响日益扩展,佛经故事《盲人摸象》《水中捞月》《九色鹿》等,^①曾入选小学课本,还改编为动画片。近年来,中国舞蹈家运用佛教壁画素材,创作出《反弹琵琶》等影响广泛的舞蹈。2000年以来,以著名的敦煌石窟为题材而创作的舞剧《大梦敦煌》,自搬上舞台后,已上演600多场,足迹遍及世界多个国家,先后获得过“荷花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荣誉。而以著名佛教寺庙少林寺为主要场景,以少林武僧为主要内容,以少林武术为基本素材的大型舞剧《风中少林》,由于舞蹈精湛、武术威猛、舞美灯光新奇、故事情节紧凑获得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金奖,并成功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贵州佛教文化传播历史较长,与道教和儒家文化交织,对民众影响较大。本书从资料收集、整理和田野调查入手,系统整理了已有研究成果,整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观点,全面、系统地考察贵州佛教文化发展史,分析现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对贵州佛教历史和现状作全面阐述。对佛教文化在当代贵州社会中的作用,社会各界在认识上还有不少误区,通过研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贵州佛教文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① 三个故事分别出自《大般涅槃经》《摩诃僧祇律》《九色鹿经》。

第一章 佛教文化传入贵州的途径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东端，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山脉众多，绵延纵横，北有大娄山脉、东北有武陵山脉，西北有乌蒙山脉，西南有老王山脉，中部有苗岭山脉。山高谷深，河流湍急，道路险峻。贵州在中国西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战国以来连接东西，横贯南北的道路逐步开通。庄蹻入滇，疏通东西大道，秦修五尺道，汉开夜郎道，唐代整修牂牁至粤桂道路，宋辟买马之路，使南北干道略具规模，但与中原联系仍感不便。自元代起，京都驿道可直通贵州。明代，朝廷从军事需要和发展经济的目的出发，重视边地驿道建设。经过整修和新建，明代贵州通往湖南、四川、云南3个方向共有7条大道。水路交通进一步发展，为贵州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佛教传入贵州的途径一共有三条：一是“蜀身毒道”，由四川经贵州、云南、缅甸至古印度（今尼泊尔南部）。这条通道开通较早，佛教沿此道传入云南并经贵州传入四川，对贵州佛教有一定影响。二是“蜀黔道”。四川佛教最早是从印度经云南传入的，其后，佛教又由北方传入四川，再由蜀黔道（由今四川叙永进入贵州毕节或由重庆入贵州遵义、贵阳）将佛教传入贵州，并在黔北、黔东北城镇和乡村扎根。三是“荆楚黔道”，此道通过水陆两路将中原佛教传入贵州。

第一节 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的起点在四川，终点在古印度。印度古称“身毒”“天竺”，史书就把这条道称作“蜀身毒道”。据现有资料分析，这条古道早在佛教创立以前就已存在，此道在古代中国与南亚经贸往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汉时“蜀身毒道”是中国与印度交流的主要通道。汉朝官员第一个发现其存在的是张骞，《史记·大宛列传》曾有记载。

张骞，汉中中。建元中为郎……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

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南方闭徯、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载此事。

张骞出使西域，在中国历代官方记载上没有通商记录的大夏（其国都蓝氏城位于今阿富汗巴尔赫省），看到由印度转口来的产自中国四川的蜀布和邛杖等商品，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西南崇山峻岭中已经开通了一条由四川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道路。汉代以前中国与印度等国间已有贸易关系。“张骞在大夏得见四川竹杖，可知印度与大夏间，印度与中国四川间，必早有商业上往来。”^②这一发现引起汉武帝的重视，他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率军队，强行开道，因受到云南西南部地方势力的阻隔，西南夷道只延伸到滇西大理一带，但民间商人经由此道者仍不绝于途，哈威《缅甸史》有载。

其地故与中国为邻，自纪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顾中国之势力，似仅限于此等通道，故遗迹极难发现……惟中国取经诸僧，常以卑谬指缅甸。^③大食人（阿拉伯）则以阿腊干与下缅甸代之。^④按：大食人之船舶，于8世纪至16世纪时，在东方海洋中握有霸权。^⑤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归服，东汉朝廷在此地置哀牢、博南两县，并将原滇西所属的隗唐、不韦及云南等6县由益州郡划出，与新置的哀、博两县合并为永昌郡，至此，西南夷居地已完全纳入汉王朝的版图。此后，东汉王朝又在秦代开“五尺道”与汉唐蒙、司马相如整治西南夷道的基础上，以数万之役凿路架桥，增设邮亭驿站。克服种种阻力，使其得以推进。这条道路历经几个世纪数代人的努力终于畅通。蜀汉时诸葛亮南征选用此道，其部从成都出发，船沿岷江顺流南下，由宜宾转入关河上行至盐津，由陆路经安上县（旧朱提县）西渡泸水。此道亦为国际通道，掸国（缅甸）于97年、120年和131年，天竺

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史记》卷三十《平淮书》记载了“汉欲通西南夷”情况，“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樊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② 释东初编著《中印佛教交通史》，台湾：东初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23页。

③ 卑谬，缅甸南部城市。

④ 阿腊干，亦称阿拉干，缅甸阿拉干人（亦称若开人）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缅甸西南沿海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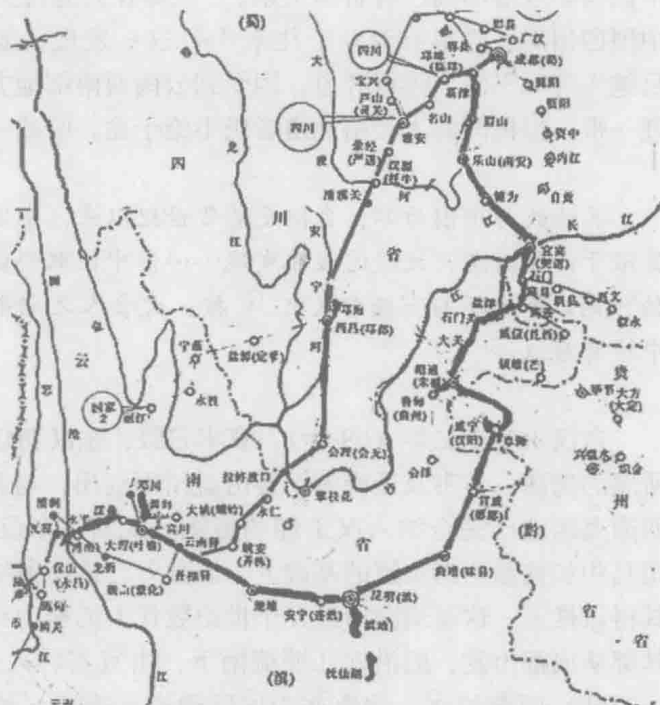
⑤ G. E. 哈威原著，姚栢译注，陈炎校订《缅甸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月第1版，第39—40页。

(印度)于159年、161年派使节来中国献礼通好。汉王朝还给缅甸和印尼爪哇国王赠送了“金印紫绶”。^①

蜀身毒道以成都为起点,有两条分支进云南。“南夷道”(也称五尺道),这条古道从蜀(成都)—沿岷江水路南下一武阳(彭山)—南安县(乐山)—犍道(宜宾)—石门关(盐津)—朱提(昭通)—汉阳(赫章)—夜郎山闽谷(威宁)—味县(云南沾益、曲靖)—滇池(今昆明)—连然(今安宁)—楚雄—叶榆(大理)—博南(今永平)—永昌(保山)—滇越(今腾冲)—缅甸—印度,总长大约2000公里。南夷道开通后,紧接着又在四川的西部修筑了一条通往云南西北地区的“西夷道”。“西夷道”从蜀(成都)—邛(邛崃)—灵关(卢山)—越大相岭—笮都(汉源)—越博(西昌)—会无(会理)—三绎县(会理黎溪)—渡金沙江—蜻蛉县(永仁、大姚)—弄栋(姚安)—楚雄(与南夷道在此汇合)。由于途经灵关、博南山和永昌(即仓唐),史称“灵关道”“永昌道”或“博南古道”。

汉代佛教对贵州已有一定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贵州清镇11号汉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两尊铸在摇钱树上的佛像,时间略晚于印度早期佛教造像,说明其直接受到了印度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印度初期佛像传入中国的途径,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经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再传入其他地区的。但蜀身毒道的存在,有可能成为印度初期佛教艺术传入西南地区的途径。^②

唐初,义净在印度游学20多年,曾在东印度支那寺遇见“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他们西行云南,经缅甸而抵该地。说明有僧人结队经由这条古道前往天竺求法,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载。



“蜀身毒道”示意图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琮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钵娜寺(原注:唐云鹿园寺也),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

① 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9—50页。

②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23—227页。

僧所造（原注：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咀罗，唐云天子也），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原注：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①

这20余名僧人赴印度时间为3世纪末。时值中国西晋末，“八王之乱”起，北方动荡，南方僧人不能再由北道即“丝绸之路”往印度求法，故而改由蜀身毒道出。玄奘到印度取经时也听说过这条古道，他详细询问当地人得知，由该地出发东行，约两月行程，即可进入中国西南的蜀地，《大唐西域记》卷十有载。

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兰加一带）“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间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氲，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地接西南夷，详问土僧，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②

慧琳在他译著的《一切经音义》更为详尽地介绍了“蜀身毒道”。^③

牂牁上佐郎反，下音哥。案牂牁者，南楚之西南夷人种类，亦地名也。即五府管内数州皆是也。在益蜀之南，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牁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检索《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志》等，说此往五天路经。^④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雋、不喜、永昌等邑，^⑤古号哀牢玉，^⑥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⑦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



“蜀身毒道”威宁连接云南宣威段

① [唐]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新罗慧轮法师》。

② [唐] 玄奘撰，辩机编次《大唐西域记》卷十“迦摩缕波国”条。

③ 《一切经音义》成书于贞元四年（788年）至元和五年（810年）。

④ 五天，五天竺的简称，即印度。经，应为径。

⑤ 余姚，即姚州；不喜，应为不韦。

⑥ 玉，应为夷。

⑦ 互羌，疑为氐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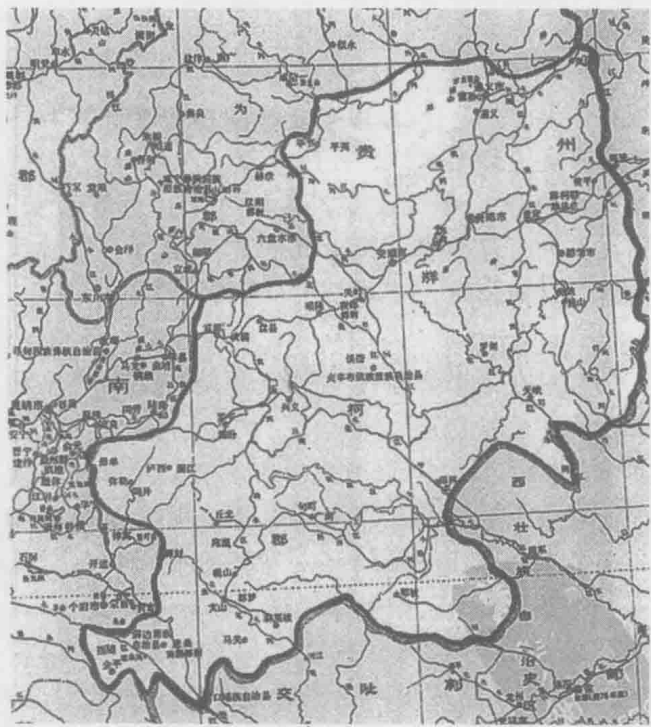
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除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沍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贳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辗转问津，即必得达也。山险无路，难知通塞，乃为当来求法巡礼者，故作此说，以晓未闻也。^①

这些由蜀身毒道前往印度的僧人，其过境贵州的行踪已不可考，但僧人结队经过贵州，而且但凡选择去印度求法的僧人，都是修持佛法达到相当程度者，会带来佛教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

在唐代，“蜀身毒道”上由南诏经黔、蜀达唐都长安的道路，是连接西南与中原的重要通道，唐代安南（治今越南河内）经略使樊绰《蛮书》有载。^②

异牟寻（780—808年在位）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遂献书檄，寄西川节度使韦皋。韦皋答牟寻书，申以朝廷之命。牟寻不谋于下，因决大计。遂三路奉使，冀有一达：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出黔中。贞元十年（794年），三使悉至阙下。朝廷纳其诚款，许其归化。^③

元代，朝廷仍重视蜀身毒道的作用。《元史·爱鲁传》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诏开乌蒙道”，爱鲁“帅师至玉连等州，所过城寨，未附者尽击之，水陆皆置驿传，由是大为赛典赤信任”。^④《元史》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⑤。《经世大典》载乌蒙宣抚司所辖马站五处：乌蒙结吉站、雪山站、合者刺站、罗佐站、叶梢坝站。^⑥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哈伯等的奏疏中



金沙江界

① [唐]慧琳撰《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上卷）“牂牁”条。

② 《蛮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等。

③ [唐]樊绰《蛮书》卷三《六诏第三》八“蒙诏”。

④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爱鲁传》。

⑤ 《元史》卷十《世祖》七。

⑥ 《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三引《经世大典》。

说：“又乌蒙北至叙州，若造船立訖水站，则陆路七八日程，顺水一日可到，俟立訖，来由水路者，使由陆路为便。”^①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云南行省言，叙州、乌蒙水路险恶，舟多破溺，宜自叶梢（引者注：今盐津）水站出陆，经中庆（引者注：疑误），又经盐井、土老、必撒诸蛮，至叙州庆符（引者注：今属四川高县），可治为驿路。凡立五站，从之”。^②

据明太祖《又赐西平侯沐英敕》记载，“……若唐阁罗凤之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经芒部诸境，外称归顺，内实挟诈，聚众积兵，据险设伏；唐将不备，遂堕其计，以致丧师几二十万，皆将帅过信、无谋故也”。说明唐代“蜀身毒道”另有一条经芒部（云南镇雄）的支线。元代，曾开通过此道。这条驿道由乌撒（贵州威宁）、经平夷（贵州毕节）、芒部（云南镇雄），连接南广（四川高县、筠连一带）。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参知政事暗都刺等奏：云南行台言，自哈刺章建都之地来者，一从本处驿道，一自秃僚蛮境。二者皆烟瘴险远，惟乌撒、芒部有一径道，近可千余里，既无毒瘴，又皆坦途。往者，为其民植茶三百里，且有凶顽为乱，故不知之。今已安静，请改设站赤。臣等议谓便益之事，宜从其请。奉旨若曰：斯言至矣，其从之。^③元贞元年（1295年）六月，臣相完泽等奏：云南驿站台官张闾，尝上言别有便道，因改立站。云南省官也先不花等却言无益以此奏遣普颜怯里迷失往视其地。今回称：张闾所言立站之地险恶，马匹伤损，已复旧道立站訖。这条道路虽然开通，但因“地险恶，马匹伤损”，不再作为官道使用。

晚唐时期，因南诏的敌对行为，导致朝廷加强了对蜀身毒道管制。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系于成都府唐”。^④这个欲借永昌道回国的天竺僧人，被当作南诏奸细而羁押。由此可推知，唐末，仍有天竺僧人和中国僧人选择蜀身毒道前往（或返回）印度。

大理国（937—1254年）时期，其统治者段氏集团拥权自重，与宋王朝若即若离，朝廷无力顾及云南。而介于大理国和宋王朝之间的今贵州属地上的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如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西南七蕃、毗那、顺化等九部落，以及予矢部、乌撒部及抚水蛮、荔波蛮等部，与宋朝的关系不甚密切，多游离于两者间，与大理国和宋之间均有贸易关系。大理国保持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的贸易往来。宋神宗时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如愚《剑南须知》载，“熙宁七年（1074年），朝旨委成都路招诱西南夷，峨眉有进士杨佐应募，自倾其家以使南诏。趣苴咩城（大理），见大云南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⑤“里堠”是古时道旁标识路程的土堆，说明蜀身毒道是畅达的。

① 《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四百一十七引《经世大典》。

② 《元史》卷十六。

③ 《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引《经世大典》。

④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第二”。

⑤ [宋]宋如愚《剑南须知·云南买马记》，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文献通考》卷二〇五。

大理国推崇佛教，大理国 22 传，有 8 人避位为僧。元代文人对大理国佛教之盛亦多有记载，“古滇中庆之盛观也，山秀海明，地灵人杰，有王邸，省宪总会之府。而碧鸡金马，太平圆照，华庭宝珠，玉案金台，绀宗琼楼，皆佛神所在。居氓慕善斋洁、茹苦食淡、手捻口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由其地连西竺，与佛国通，理势然也”。^①“云南去天竺，里以万数，而真乘佛印与儒典并兴。上自豪贵，下及贱隶，莫不顶戴钦奉”。^②“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③

蜀身毒道是早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南诏时期，佛教在其境已有较大发展。唐代，南诏疆域曾包括今黔北、黔西、黔西南的部分地区。唐咸通十四年（873 年），南诏出兵攻陷播州，今贵州几乎全被其控制。南诏国民多信佛教，对其占领地有影响。南诏势力在贵州境内还建了寺庙，如正安建有大成寺、遵义建有大悲阁等。

“蜀身毒道”不仅传播了佛教，还包括早期佛教艺术。因为，从长安经由成都、云南、缅甸道去印度，不及从“丝绸之路”往印度的路程的三分之一，故印度初期佛教艺术也经此道传入我国西南地区。^④

第二节 南夷道

隋唐以后，内地佛教兴盛，蜀黔道成为中原及四川佛教向滇黔传播的重要途径，古时称为“南夷道”。

南夷道开筑于汉武帝时。建元初年（约前 140 年），汉武帝欲开通南中，令蜀开通南中道。犍道令受命修筑，因工程艰巨，筹划不宜，修建数年未成。适逢中郎将唐蒙奉命入南中，以道不通，执令行斩。随督兵夫赶修，由犍道（今宜宾地）连通平夷（今毕节）。《华阳国志》载，“犍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⑤元光五年（前 130 年）夏，武帝复使唐蒙“发巴蜀卒治南夷道”，开犍门，通南中，连牂牁江（今红水河）。“元光六年（前 129 年），南夷始置邮亭”。^⑥此道另有一条支线，即由成都沿岷江水路南下到宜宾，再沿长江抵重庆，

① [元] 述律杰《重修大胜寺碑铭》，“□”为碑文中无法辨识的文字。

② [元] 支渭兴《重修五华寺记》。

③ [元] 郭松年《大理行记》。

④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27 页。

⑤ [晋] 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南安县”。犍道，今宜宾；南广，今高县、筠连一带；平夷今毕节。但实际上此路应为由成都经泸州，出永宁（叙永），至平夷（毕节）。因为，宜宾溯南广河，经高县及珙县，至云南之威信、镇雄，平夷（毕节），既僻且险，汉晋时开辟驿道的可能性不大。

⑥ [清] 道光《贵阳府志》卷一《大事纪上》。“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见《史记·大事表》。

由陆路经播州（遵义）到贵州（贵阳）。

洪武四年（1372年）十二月丙申。

置永宁、贵州二卫及瞿塘关、汉中、阶文三守御千户所。时，曹国公李文忠理军务于四川，奏：“贵州今隶湖广，而其地在城（成）都西南，计成都水路至重庆三十六驿，重庆陆路至播南九驿，播南陆路至贵州五驿，凡五十驿。贵州由播南、思州界至沅州以达辰溪二十一驿，辰溪至湖广一十六驿，凡三十七驿，比之成都至贵州水路少二十驿，陆路少七驿。如遇发兵，自成都至重庆虽三十六驿，然顺流而下，舟行捷疾，以及贵州陆路止一十四驿，若湖广至辰溪一十六驿，辰溪至贵州二十一驿，皆源上流，驿虽少而路远于成都矣。今议以贵州卫属成都都卫，便于节制，而凡军务之急者，贵州一移文成都都卫，一移文武昌都卫。若民职有司则属河（湖）广行省为便。”诏可之。^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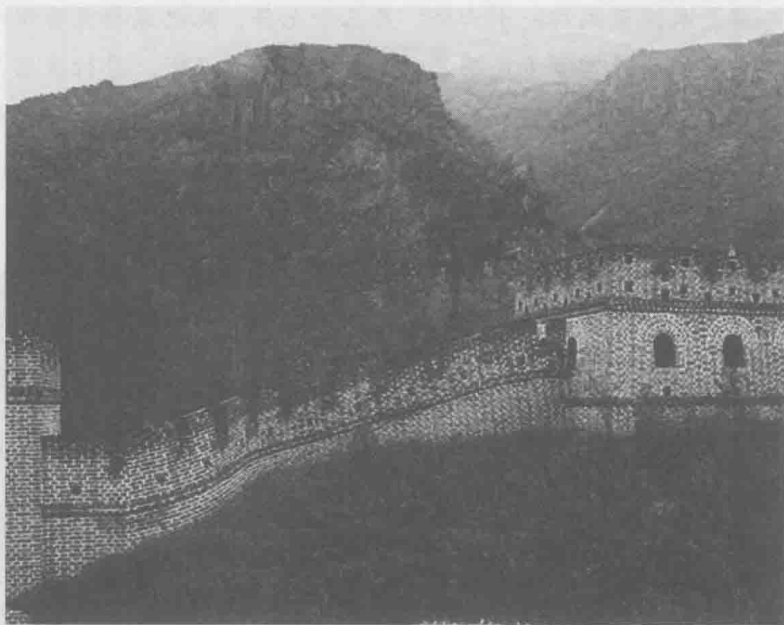


南夷道毕节赤水河段

^①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十。

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①

这条道被称为南夷道（亦称夜郎道），其线路走向为成都—泸州—永宁（叙永），由永宁经赤水驿（今毕节县川黔交界处），阿永驿（今毕节县境）、层台驿（今毕节层台乡）、毕节驿、周泥驿（今毕节与七星关间）、在城驿（威宁县），在此连接由（成都）—犍道（宜宾）—石门关（盐津）—朱提（昭通）入贵州乌撒的驿道，前行至云南，入缅甸，抵印度，开通时间无考。但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用李恢为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治今毕节）。^②故至迟在蜀汉时已有此道。三国时诸葛亮南征亦由此道出。“蜀之西南，关之雄险者，七星也……昔诸葛驻师七星营于兹，故号其名也”。^③《新唐书·南蛮》载，“（韦）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纳川与南诏会”。^④此次军事行动就使用了这条古道。唐



毕节七星关（重建）

天宝时思州府鳌山麓般若招提园僧人通慧，奉召入京为皇上疗疾，当由此道北上。海通入川建乐山弥勒大佛，此道也应为其首选。宋代则常为军旅取用。元朝，这条古道已成为川黔滇的骨干通道，并进行重大整治，设置邮传。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壬午朔，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帅步骑三十万征云南，并授友德以进取机宜”，“丁未，友德至湖广，分遣郭英、胡海等，一由四川永宁趋乌撒，一由辰、沅趋贵州”，“十二月丙寅，下曲靖，友德帅众趋乌撒，分遣蓝玉、沐英趋云南。……友德城乌撒，克七星关以通毕节。于是东川、乌蒙等诸蛮悉降”。^⑤洪武二十年（1387年），“沐英奉诏，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置一营，又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笮关，在今四川叙永北，泸州南。

② 《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李吕马王张传》。

③ 明永乐毕节卫指挥金事秦光《应星桥记》。载毕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毕节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128页。

④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蛮上·南诏上》。

⑤ [清]夏燮撰《明通鉴》卷一。